

徘徊在边缘：都市“洗脚妹”的生态特征与社会流动

——来自“脚都”长沙的一项社会人类学考察^①

黄 海

摘要：作为现代城市的边缘群体，都市“洗脚妹”较少被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本文在对难以融入城市的都市“洗脚妹”群体生态特征与社会流动进行叙事的同时，借助田野调查，找寻出都市“洗脚妹”社会流动的脉络及其机制。

关键词：都市“洗脚妹” 生态特征 社会流动 边缘人

一、研究缘起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社会分层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内容、形式、形成的层次和分布形态，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社会流动则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各层次间的互动、动力机制、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量变过程（陆学艺，2004：18-20）。社会流动一直以来都是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并且与社会分层研究密不可分。美国社会学家 P. A. 索罗金在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一书中，就将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结合起来研究，并强调以定量方法对社会流动进行流动的数量、方向和地区分布研究（陈婴婴，1994：23-47）。而布劳和邓肯的《美国的职业结构》则是对社会流动进行定量研究的典范（严善平，2000：104-114）。

国内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也起始于社会分层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陆学艺、李强等人所做的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分化的研究。陆学艺的《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对我国农民阶层分化情况进行了详细研究与探讨（陆学艺，1991：3-11），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李强，1993：70-110）亦是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他们都是基于布劳和邓肯的理论对我国社会流动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实施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以及后来组织实施的《青年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源开发》调查，都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了探讨和解释，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严善平，2000：104-114）。

近年来，随着社会流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社会流动渠道和机制的探讨成为社会流动研究的热点。唐世平研究了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唐世平，2006：85-97）。也有研究者通过对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社会网络演化过程及其基础的考察，探讨了社会流动的脉络与机制问题（郑丹丹、张芳，2006：7-13）。这些研究都探讨了社会流动的可行渠道和社会流动的机制问题，对于全面了解社会流动及其对于个体的意义与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探讨社会流动机制外，还有很多学者研究了社会流动的限制问题，认为户籍、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减少了农民的社会流动选择余地、增加了农民的职业边缘化可能和提高了其流动成本（周玉，2006：19）。但是，纵观现有社会流动的研究，对一些边缘人群的社会流动机制与流动脉络却缺乏深入探讨，为此，本文拟以长沙市洗脚妹的流动故事为例，

^①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所涉及的部分娱乐城和人名皆做了技术处理，章伟博士对本文观点亦有重要贡献。

对其生态特征及其社会流动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推进对边缘人群社会流动脉络及其机制的理解。

所谓边缘人又称为边际人，最早由 K·勒温（1997：37-41）提出，费孝通先生则给出一个价值中立的学术分析概念：“受到不同文化波及的人，可以称作‘边际人’（边缘人），这是文化接触中出现的现象。（费孝通，1999：45）”在西方的社会学界，“边缘人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芝加哥学派（CHIS）和伯明翰学派（CCCS）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研究城市的“边缘人”和“亚文化群体”，芝加哥学派涉及波兰农民、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以及犹太移民，伯明翰学派关注无赖青年、足球流氓、飞车党、混混小子、摩登派和“朋克”等。西方社会学中的边缘人研究具有一个明显的共性特征，即研究者长期进入社区对典型案例进行田野调查，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用民族志叙述文本建构研究“他者”，并保持理论反思，比如哈姆弗雷斯（Humphreys，1975：21-37）研究了性交易者的日常工作范围、交易形式和活动区域，对于她们的非语言身体特征做了深刻描述。沿着这些边缘群体研究的脉络和研究方法，本文对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边缘群体——都市“洗脚妹”进行深度田野个案研究，解析其生态特征和社会流动模式。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作为全国知名的“娱乐之都”，湖南省长沙市近年来的娱乐休闲业迅速发展，大大小小的洗脚城更是随处可见。置身长沙城内举目四望，无论是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还是在大街小巷旁，都可以看到霓虹闪烁、设计各异的“足浴坊”、“爽足城”、“洗脚城”的招牌。因此，长沙也就被戏称为“脚都”。^①在足浴城中，主要是以18-28岁之间的年轻女性为主为客人洗脚，这些年轻的女性大多来自农村和小县城，在足浴城自称为“技师”，外界则普遍称作“洗脚妹”。据《脚都》作者的不完全估算，仅长沙主城区就有大小不一、档次不同的各种洗脚城上万家。如果以每家平均有30名“洗脚妹”为计算单位，那么从事洗脚职业的“洗脚妹”就有近20万，而长沙的城区人口也就刚刚200万。

近20万的都市“洗脚妹”，她们为何选择这样的一种职业寻找进入城市的门槛，她们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对城市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城市对她们又是怎样的一种认知，她们最终能否在城市中找到“扎根”的理由，是本文调查的主要兴趣所在。对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相对难以深入接触的边缘群体进行调查，单纯的问卷统计显然无法完全获得答案。因此，田野调查、深度的个案剖析和叙事性的表达就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田野调查强调经验本位和内部视角。本文将都市“洗脚妹”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从都市“洗脚妹”的内部视角出发进入研究场域，对其进行“他者”和异文化考察，在社会急剧变迁与城市化转型的大背景中理解都市“洗脚妹”，描述她们的生存状态，解析她们的社会流动模式。

深度的个案剖析强调对个案的深度挖掘。本文对都市“洗脚妹”进行深度的个案访谈，对不同对象、同一对象进行深度的各类考察，以尽可能真实地映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态、社会心理特征和社会流动模式。当然，这种个案堆积起来的经验能否完全客观地反应研究对象，并进而能否具备代表性是“难免被质疑的”^②（吴毅，2007：57-112）。不过，本文是以个案的深度剖析来获得对都市“洗脚妹”这一群体的深度性理解，寻找一种能获得普遍性理解的脉络。在对个体进行深

^① 湖南的知名作家于建初在广泛调查长沙的洗浴行业以后，写了一本《脚都》的小说，就是以长沙城市为背景。据该作家调查核实和估计，长沙大大小小的洗脚城是上海和北京的总和！所以该书出版以后，长沙也就有了“脚都”之称号。

^② 吴毅认为，对个案研究的质疑集中在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问题上，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实证化的思路。似乎个案研究的意义在于个案之量的积累和类型的丰富。不过只要是在科学—实证化的进路内做个案研究，而又期望以此来探讨代表性和普遍性问题，就必然会遭遇到一个方法论难题。

度考察的同时，同样也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个体所属群体的特征。换句话说，本文是以个案的深度及其逻辑呈现来反映问题的共性。

叙事性的表达方式是本文的第三种主要研究方法。叙事对于弥补“边缘人”研究中互动方式的脱节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叙事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而且也是一种认识方式与理解方式。叙事要求研究者放弃自己的主位立场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59：1-2），倾听被研究者的声音，让都市“洗脚妹”自己的声音在研究中自然呈现，而不是被呈现、被表述、被建构。这样，我们或许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问题。首先，叙事“可以展现行动之间复杂的、适合的因果关系”^①（应星，2006：74），对于过程性、流动性和历时性的问题，叙事往往更适合表达。其次，叙事同样也是一种解释方式。从知识学的角度而言，撇开后现代主义“碎片化解构”的极端化言说方式不提，叙事其本身就已经“隐含了叙事者对叙事对象进行组织、分析和表达的诉求。这些诉求总是受到特定理论后台的操控，这个后台就是组织和解释叙述对象的角度、立场和方法。也就是说，叙述不仅组织对象，更组织关于对象的认知”（吴毅，2007：85-90）。

都市“洗脚妹”作为社会变迁中的一个边缘群体，从乡下来到城里，从县城来到省城，最后又从城市回归乡村，具有典型的过程性、流动性和历时性特征。因此，要发现都市洗脚妹的真实生态，挖掘其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真正体验、行动和感受，采用人类学的田野个案研究方法，运用过程性的叙事表达方式，应该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途径。通过历时性与流动性的叙事解释模式，不仅都市“洗脚妹”的生态特征与社会心理得以展示，其社会流动的逻辑也得以自然呈现，对都市“洗脚妹”的理解和解释也就更接近真实。

从2009年2月开始，作者前后费时5个月对长沙的十余个大小不一的洗脚城进行实地调研，先后对二十余名“洗脚妹”进行长时间的固定观察和深度访谈，本文故事中抽取出来的主人公既有来自农村的也有来自小县城的，既有湖南本省的也有四川、贵州、重庆等外省市的，全部都是未婚女青年，年龄跨度从18-28岁不等。

三、“洗脚妹”的生存状态：挣扎于边缘

对于都市“洗脚妹”而言，每一天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长沙是一个消费大众化的娱乐城市，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长沙的夜晚是从晚上10点才开始的”，这也决定了长沙的足浴行业服务特点：上午歇业，中午开始营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2-3点左右才收工。因此，“洗脚妹”们也往往就是在中午时间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然后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2-3点才能休息。小刘是一位从湘西某贫困山区来的农村姑娘，今年25岁，已经在长沙的几个洗脚城工作了5年，对于这种生活与工作方式，她表现出明显的疲态。

“以前在乡下的时刻虽然穷一点，但感觉比较自由，现在每天就是这样重复再重复，生活也是无趣，新来的姐妹们中午起床时还互相鼓劲，说今天要努力一点，多做几个钟^②，我们这些‘老人’都是麻木的不想说话了，鼓起勇气从床上爬起来，又开始一天的苦熬，感觉这日子啊，还是没意思，和农村一样”^③。

而作为小刘的徒弟，今年刚初中毕业就从贵州乡下来到长沙的18岁姑娘小王，在足浴城刚工作不到半年，却表现出了一种对现在生活的满足和对未来前景的憧憬。

① 应星认为，通过叙事，既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发现一般性、客观性的规律或规则，也不只是像文学那样重在塑造生动的、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是由此去体味中国社会的独特滋味。能够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够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能够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能够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

② 足浴行业的行语，一个钟即是对洗脚妹为一个客人进行足浴服务的时间，一般为60-70分钟左右一个钟，足浴城定钟的长度不一，价格也不一。

③ 所有访谈材料都来自笔者2009年2-7月关于洗脚妹访谈的调查笔记，以下不一一标注。

“现在这样当然好啊，至少比我以前在乡下好多了，乡下生活太苦，家里太没钱了，我上学都是断断续续的，一直到18岁才勉强读完初中，到这里以后至少生活安定下来了，每天都包吃包住，挣得钱基本上可以不动，都可以寄回家里，在这边挣了钱，以后成了家，说不定还可以成为城里人。”

小王口中的能挣钱，其实在长沙这个城市不算什么，按照长沙现在每平方米4000元的房价，她一个月收入就算全部存起来也只能买不足0.5平方米。而按照长沙足浴城的行规，“洗脚妹”的收入全部靠提成，没有基本工资。只有刚入行的“洗脚妹”，在足浴城有1-2个月的学徒期，由专业技师或资格老的“洗脚妹”带徒，每个月由足浴城包吃包住并提供1000元的基本工资。1-2个月学徒期满后，足浴城给其正式编号，“洗脚妹”才能开始独立为客人服务，基本工资随之取消，每月拿提成收入，当然足浴城仍然为其提供免费食宿。长沙各足浴城根据装修水平、规模大小和服务质量高低，每个钟的收费标准也从35-50元不等，而按照行规，“洗脚妹”每做一个钟的提成收入是服务费的30%左右，即客人如果做一个35元的钟，“洗脚妹”可从足浴城拿提成10元，如果客人在收费较贵的足浴城做一个50元的钟，“洗脚妹”则可从足浴城拿15元的提成。那么，一个“洗脚妹”一个月到底能拿多少呢？小刘说：

“以前长沙的洗脚城没有现在这么多，技师（洗脚妹）也没有这么多，我那时挣得多，人也年轻也有力气，一天做10个客人，一个月挣三千多，都是小事。现在不行了，现在我每天起来后从上钟到结束，最多的一次是一天接待了10个客人，而最少的也有6-7个客人，也就是说一天大概挣100元左右，但一个月下来不可能挣3000元，因为一是老板有规定，每周必须休息一天，一个月必须休息四天，二是自己的身体也吃不消，一天如果洗了3个客人以上的脚，自己全身也就没一点力气了，这时候就真的不想再洗了，除非是客人专找我的‘点钟’，否则一般的‘上钟’我就会故意磨洋工拖延时间或者干脆请假休息。”

足浴城安排洗脚妹给客人服务一般是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她们的编号看她们是否在上钟而随意安排，另外一种则是接受过某洗脚妹服务的客人觉得这个洗脚妹服务的好，下次再来时固定叫这个编号的洗脚妹接受服务，就叫做“点钟”。被点钟的洗脚妹每被点一次钟就可以多拿2元的提成，所以洗脚妹们每次给客人服务完后，总要说一声“xx号技师为您服务完毕，感谢您的光临”，一方面是表示礼貌，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客人记住自己的编号，能下次对自己“点钟”。按照小刘的说法，一个“洗脚妹”平均每天要为6个以上的客人服务，一天收入没有超过100元，一个月除掉老板规定的休息日和自己的休息时间，一个月大概能挣2000元以上2500元以下，这种收入在一个以高消费著称的省会城市，实在不能算是高薪，尽管如此，一种对于未来的期望仍然让小刘这样的“洗脚妹”坚持了下来。

“我想先在长沙这边赚点钱再说，把老家父母因为建房子欠的债先给还了，以前每年都寄2万回去，今年可以不用寄了，一年可以存下2万块钱的样子，我准备还做3年，就可以存6-7万块钱了，今后回老家结婚，做点小本生意的钱也就够了。”

“存钱当然是可以存的，反正吃饭不要钱，住宿也不要钱，平时也不用买什么化妆品，上钟时要穿工作服，所以买衣服花的钱也少，平时每天就呆在足浴城里，空闲的时候就和姐妹们聊天，或者抓紧时间睡觉休息，也没有这个心思出去玩，所以每个月基本上花不到二百。说实话，到长沙这么久了，我也就是在附近转过，什么旅游点，什么步行街，我都没去过，自己当然是想去的，但去了就会花钱，所以就咬牙不去。”

尽管就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但“洗脚妹”们却几乎与城市的繁华无关。二十几岁的姑娘，正是喜欢打扮和玩乐的年纪，但生活的压力使得“洗脚妹”们一天24小时几乎全呆在足浴城里，或者是忙挣钱，或者是不敢出去怕花钱。虽然吃饭和住宿是不要钱，但吃饭的质量实在是低。这一点，就连刚从乡下来的小王都觉得难以忍受。

“菜不好吃，荤腥很少，基本上都是素菜，而且老板怕我们吃刺激性的东西有口气影响客人，菜里基本上不放重口味的东西，菜的分量也不多，10个人吃四菜一汤，吃的慢一点菜就没了，饭倒是够，我们洗了几次脚后体力消耗很大，也就不计较了，只要能吃饱就行。”

不过吃饭不按时，要是客人在中午还要洗脚，那肯定上钟的那个姐妹只能饿着肚子先干活，而其他的人又如果凑不齐10个人坐一桌，也不能开餐，大家都只能饿着肚子等着。”

值得一提的是，“洗脚妹”们休息和睡觉并没有固定的宿舍，而是自己插空在给客人服务的包厢里找地方睡觉，如果哪间住有“洗脚妹”的包厢有客人来了，“洗脚妹”们就得提前转移到别的空余包厢。这意味着“洗脚妹”们日常生活的空间除了包厢还是包厢，面对的对象除了客人还是客人，而接触的除了一双双脚，就是一盆盆给客人洗脚的药水。常年累月的不见阳光，日积月累的与药水和脚打交道，“洗脚妹”们的脸是出奇的白净，但手却是几乎没有一个是光滑的，长满了粗茧，甚至是药水和客人脚部感染所引起的手部溃烂。

“我现在都是带着塑胶手套给客人洗脚，因为两年前手就已经被药水和有些客人的脚感染弄的经常溃烂，冬天还好，只是长冻疮，夏天最头疼，动不动就溃烂，但客人总是喜欢我们直接用手洗脚，这样他们感觉更好，但我们就吃亏了，而一旦手长茧或者溃烂，客人就不喜欢了，有时候还要求领班换人给他洗，所以我现在经常提醒小王她们，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手，不然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除了与药水、客人打交道，“洗脚妹”们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和自己一起洗脚的姐妹们。一天工作之余或闲暇时间将自己的烦心事、开心事和姐妹们聊聊，可以在这个寂寞的城市中互相寻找一丝慰藉和温暖，也只有在此时，这些平时脸上总表现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的年轻女孩们，才能恢复一些青春活泼的本性。不过，因为潜在的“点钟”竞争和“上钟”分配不公问题，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难免有或多或少的冲突，这种冲突积累的时间一久，最终也将“洗脚妹”之间的这种温情消除，她们之间原本渴望的相扶相助也变成了一种幻想。小刘对此有深刻的感触。

“老板每个月底要对我们根据工作量和工作表现排一次末位，排末位的那个人会被扣100-200元左右的奖金，而且还要被公开批评，排前面的得表扬、发奖金。但实际上那些长的漂亮一点的，经常偷懒但嘴巴乖巧跟老板打小报告的，本来应该排末位就不会排。那些本份做事、偶尔发点牢骚、讲点怪话的就排末位，但这些话是怎么被老板知道的？还不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人说的。所以你看那些新来的人都是扎堆聊天，很融洽的样子，我们这些老人基本上是独来独往，互相提防，新人们不用多久也就会跟我们一样的，在这种环境讨生活，不防着点别人是不行的。”

如果说仅仅是药水的侵袭、客人脚感染的痛苦、姐妹们之间的隔阂还能让“洗脚妹”们容忍，那么“洗脚妹”们尤其是长相还比较清秀的“洗脚妹”，所经常遭受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骚扰和侮辱则是最令她们难以接受的。几乎每个长得漂亮点的“洗脚妹”都或多或少地遭受过性骚扰，这已经成为足浴城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与小刘一起工作的小夏，来自江西的一个乡镇，今年20岁，长相比较清秀，本来在另外一家足浴城当“洗脚妹”，就因为不堪忍受这种侮辱而跑到了现在的这家足浴城。

“到足浴城的大部分客人都是好的，经常在我们洗完脚后还说声谢谢，对我们也尊重，但也总是有一些客人喜欢占便宜，语言调戏，或者动手动脚的。一般情况下，客人如果在语言上过分一点我们都忍了，没办法，吃这碗饭就得能受气，否则客人一投诉，我们不仅本次服务没有提成，而且被客人连续投诉三次以上就要被开除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太过分，我们都是能忍就忍。”

“但有一次，一个喝了酒的客人很过分，我就说请他尊重一点，我是技师，不是小姐。结果他当场就给我一个耳光。我和他顶撞了起来，他就大吵大闹，投诉了我，结果老板当场逼着我给他道歉，还扣了我的当次提成，一气之下，我就换了个地方了。”

小夏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洗脚妹”们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是情节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已。作为城市中的弱势与边缘群体，她们只身来到城市，往往成为自身难保的弱女子。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洗脚妹”都有两种普遍的心理：一是底层小人物的怯弱，因为怕丢饭碗和遭受老板的惩罚，同时也因为自己孤身在这个城市，而惧怕被某些强势的客人报复，因此对少

数客人的不规矩行为忍气吞声。小夏就坦言自己离开当初的娱乐城就是因为怕那个客人的报复。二是异常的敏感。几乎每个“洗脚妹”都不喜欢自己被称为“洗脚妹”，而是喜欢被称为“技师”，甚至在生活当中互相也是以“技师”相称，大家出奇一致地对“洗脚妹”这一称呼进行抵制，职业的“认同感”以一种“自欺”的方式体现的异常强烈。

“我们自己认为当然是技师，每个人进来都要培训至少2个月才能上岗的，而且从医学和中医理论来说，我们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报纸上不是经常报道有大学生毕业后也当‘技师’的吗？再说了，我们给人洗脚，能帮客人有利健康，我们是在凭自己的双手和劳动挣钱吃饭，别人怎么说我们不管，但我们自己要尊重自己。”

说这话的是23岁的重庆某县姑娘小李，已经在长沙的几个足浴城呆了3年。在我访谈的“洗脚妹”当中，她是最有文化和理想的一个。从小县城来的小李，高中毕业后因为就业困难，想出来见识和闯荡一番，最后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进入了城市。进入城市后，小李才发现这一职业的辛酸苦辣，与其他姐妹一样，她的生活也就是局促在足浴城这个狭小的空间，每天与同一种药水和各种不同客人的脚打交道。现实的生活将年轻时的梦想一点点无情地消磨，每天生活在城市之中，但生活世界却与这个城市无关，城市的生活应该很精彩，但那只是足浴城外面的世界。只有到了规定的休息日，约上几个姐妹到长沙到处走走看看，买点零食和日用品，才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真实气息。

“每次休息日出去玩一下，自己才感觉到了这个城市，和姐妹们一起可以说说笑笑，这个时候也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个年轻姑娘，也需要阳光和各种生活乐事，但走在人群中，总是一种陌生感，但我总是克制自己不去想这些，而是尽量快乐地过完这一天，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我才可以脱离药水和脚，去接触和感觉这个城市生活，意识到自己。但到了要回足浴城时，心里才猛地清醒过来，尽管我是‘技师’，尽管我很努力，但我就是一个洗脚的，我不属于这个城市，这里的繁华与热闹与我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有思想的人是痛苦的。其他“洗脚妹”们只是感觉到生活的单调、麻木、压抑与乏味，但小李却意识到，不管自己愿不愿意承认，“职业无贵贱”对“洗脚妹”而言只是一种奢望，“技师”并不能带给她们融入这个城市的真正社会资本。无论如何，在城市中“边缘”地存在和挣扎，就是她们的生存现状，或许唯一有可能改变她们“边缘”地位的就是她们的社会流动了。

四、“洗脚妹”的社会流动：徘徊于边缘

和“洗脚妹”小李的访谈是在今年4月，就在7月初，小李回重庆老家了。回去的理由是因为父母亲催其回去结婚，但私底下小李说出了她的真实想法。

“迟早是要回去的，刚来长沙时，我心里还有些梦想，总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个城市的认同，说不定最后能摆脱以前的贫穷和乏味的生活环境，获得一种新的生活。但现在我想明白了，这真的就是一个梦想，仅仅就是一个梦想，城市其实不属于我们，也不可能真正接纳我们。”

小李觉得自己花了3年时间，总算做回了一个明白人。虽然也有姐妹们和她说，可以趁现在挣了几万块钱，在长沙租个门面做点小生意，或者摆个小摊，然后再买个商品房，就可以留在长沙了。但那要多少年呢？十年还是二十年？小李没有把握，反正是看不到希望，在这里苦熬，还不如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苦熬，与其孤身在城市里没有希望地做一个卑微的“边缘人”，还不如回去做一个至少有父母亲在身边关怀的社会底层人。小李的梦想历程实际上代表了绝大部分都市“洗脚妹”的真实心路。在其他众多“洗脚妹”的叙述中，尽管流动似乎就是从那个足浴城到那个足浴城，但她们心中的最大流动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真正地进入城市，寻找一种新的生活，获得一种新的命运。而进入这个城市的最终办法无非两条：一是找一个能看上自己的城里人，二是自己挣钱后在城市里买房置业，进而扎根。小刘就坦言：“说不这么想是假的，姐妹们心里其实都在做着这个梦，梦想有一天有一个城里的白马王子看上了自己，然后自己忽然就从灰姑娘变

成了公主。所以我们看电视里那些爱情剧总是哭的稀里哗啦的，聊天时也互相开玩笑，今天有没有哪个年轻的客人对自己特别好。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都说自己是‘技师’，可是你想哪个城里的年轻人会看上我们，城里人从骨子里是看不起我们的，没有谁会真的找个洗脚的‘技师’带回家。”

居于城市边缘生活，为进入城市而挣扎的都市“洗脚妹”，内心的想法往往能反映她们日常生活世界中最真实与最残酷的一面。所追求的恰好就是生活中所缺乏的，在她们口述叙事当中，能够在城市扎根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想法，换句话说，这种想法已经成为她们在城市边缘中挣扎的一线希望。小刘在长沙已经呆了五年，内心里也总是有这个梦想，尽管她也知道这个梦想是那么的 unreal 和遥远，但作为未来生活的一种精神寄托，这个小小的梦想总是能给她们的“边缘生活”带来些许的亮色和希望。不过她最终还是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梦想是不能当真的，最后等待她的命运还是回老家找一个和自己门当户对的人结婚，然后复归边缘的乡村生活。

“家里已经安排好了，过完今年就要我回家结婚，反正家里的债也还清了，我的嫁妆钱也有了，家里给我定了一门婚事，是邻乡的一个年轻人，也在外打工，双方父母都催着我们办事。之所以找邻乡的，就是因为他们家都不知道我是‘技师’，如果知道了他们家不会答应的，我们老家的人对我们这一行其实也是看不起的。我也想通了，就这么将就着过吧。”

与小李和小刘的现实考虑不同，小刘的徒弟，刚刚入行的小王则有另外一种自己觉得更现实的考虑。

“我反正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就是以后要饭我也要在城市里熬下去。现在的生活是苦，但总比在老家好啊，吃饭睡觉不要钱，挣的钱可以不动，我准备做个5年，就可以存上10万块左右了，然后去租个门面做点小生意，赚了钱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再买个小房子就可以在城里稳定下来了，再找个城里的对象，我对自己有信心。”

小王的想法却遭到了其他“洗脚妹”的取笑，大家都说刚入行时都是这种心理，工作了两三年之后就不会再说这种话了，麻木和残酷的现实生活最终会将年轻时的激情消磨殆尽。今年25岁的四川姑娘小张，是我所接触到的唯一一个曾经脱离过“洗脚妹”身份，而又最终重回足浴城的“洗脚妹”。谈起自己的奋斗和流动历程，她是一肚辛酸。

“做了2年后，我干脆用存的钱进了点零碎的日常用品，比如袜子、手套和鞋垫什么的，开始摆地摊卖。那个时候其他姐妹们都羡慕我，觉得我终于能够有个好的开始了，以后可以慢慢地留在城市，做个城里人了。”

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小张很快发现，想单纯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城市里扎根是多么的困难。首先是小本生意不好做，一天到晚四处打游击躲城管，其次是城里人对这种年轻外来妹的歧视严重，每次租房子时被别人用怀疑的口气反复审问，生怕自己是个“出来卖的人”。就算租到房子，当地社区居委会、片警还隔三差五地突击检查。与其他在城市里漂泊的农民工一样，遇到城市里申报“文明城市”或举办大型活动时，她也要被毫不留情地赶出城市。终于，小张想扎根在城市的梦想破灭了。

“小生意根本就不好做，没有经验，进的货成本高，生意也不好，城管还天天赶着我到处跑，一天卖不了几个钱，刚好够生活。而且还要自己找地方住，要吃饭，做生意被人赶，住房子也被别人赶，四处漂泊像个盲流，活得像只耗子，自己都感觉到很卑贱，而且一年下来，我发现比在足浴城挣的钱还要少，这样一算，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凑够在长沙买房的钱，干脆还是回来足浴城算了，不做那个梦，老老实实挣点钱，然后回老家算了。”

“洗脚妹”进入城市后，种种努力并不能改变她们在城市中的“客居”和“边缘”角色，所谓的社会流动往往只是从这个足浴城流动到那个足浴城，从小足浴城流动到大足浴城，但其城市边缘的身份依然未变，被城市主流文化所隔离的处境也没有改变。回归乡村后，在城市中当“洗脚妹”的经历还使得她们在乡村中难以抬头做人。准备回家嫁人的小刘就说男方只知道自己在城里打工，具体做什么她根本就不敢告诉男方，父母亲对她的这段经历也守口如瓶，生怕乡邻知

道后影响家里的声誉。因为在传统文化浓厚的乡村社会，“洗脚妹”对于乡村主流价值而言是一种不上“台面”的职业。小张谈起未来，也是一脸茫然。

“回家后干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了，农活一是不会弄了，二是不想弄了，看看能不能做点小生意吧，要不就干脆找个人凑合嫁了算了。但不管回不回去，就是不能让村里人知道我们是洗脚的，否则不仅我，我的父母亲在村里也抬不起头做人，脸上无光。农村人总觉得做这种事丢脸，甚至好像觉得做这种事是不正经的。有时候想到这些就烦，生活没有奔头，不去想自己现在哪里，也不去想自己以后能在哪里，干脆趁着年轻还能吃得消，每天多洗几双脚，多上点钟，做几年后就回家。”

都市“洗脚妹”的“城市边缘”经历除了能给她们增加一笔与老家相比还算不菲的财富之外，并不能给她们带来新的社会流动契机，犹如一种“玻璃瓶的底层效应”——能看到上层，却无法到达上层。都市“洗脚妹”的生态特征表明，她们生活在城市当中，实际上却又与城市无关，都市“洗脚妹”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社会流动模式说明，她们想留在城市当中，但却难以真正地留在城市，最终不得不接受回归乡村的现实命运。她们居于城市的边缘，每天能看到城市却无法真正融入和被接纳到城市。作为城市的过客，从生存状态到社会流动，都市“洗脚妹”都是从边缘复归边缘。

五、结论：“洗脚妹”的“内卷化”社会流动

当下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性巨变正在发生，社会转型研究由是也成为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变迁与结构性巨变的重要视角。都市“洗脚妹”作为“大转型”（波兰尼，2007：1-2）过程中所出现的边缘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与农民工相似，常游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却又不能在城市真正“扎根”。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她们不停的奋斗与抗争，但最终结果还是只能从边缘复归边缘。

因此，在探讨、研究都市“洗脚妹”时，首先要将其作为一个边缘群体来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恰当地、适时地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和分析。费孝通（1999）认为，“边缘人”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社会文化差异，喻示了在同一个区域各种边缘人群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文化碰撞机理。但是除了文化之外，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也十分巨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变迁的效应^①。无论是城市中的“街角青年”和“混混”，还是都市的“洗脚妹”，这些边缘群体的产生都是社会变迁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存在是边缘人存在的重要因素。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碰撞与文化差异导致大量的流动人口成为“候鸟型”的往返迁徙者，他们无法接受城市的规则，城市也难以容忍他们的差异。都市“洗脚妹”离开农村的时候，怀揣美好的梦想，但在城市的边缘生活中，既无法用传统的经验开创新的生活，也无法被主流文化所融入和接纳。

作为边缘人的“洗脚妹”，其社会流动呈现出“内卷化”的特征。黄宗智在分析华北地区小农经济社会时，对农业有增长却无发展的情况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理论。所谓“内卷化”，即随着农业人口的增长，土地维持现量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在土地上进行密集型培作，表面上数量的增长实际上是农业的“内卷化”，陷入了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黄宗智，2000：35-44）。我们通过研究都市“洗脚妹”这一群体的社会流动脉络及其机理发现，边缘人社会流动机制亦是表现出“内卷化”的特征：

首先，从社会分层来看，都市“洗脚妹”的“城市边缘”经历除了能给她们增加一笔与老家

^① 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包括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包括自然环境引起的社会变迁、人口的变迁、经济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变迁、文化的变迁。社会学分析社会变迁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相比还算不菲的财富之外，并不能给她们带来新的上升流动机会。都市“洗脚妹”固然从乡村来到了城市，但这只是地理空间的转换，身份仍然是城市里的边缘人，社会阶层仍然是城市中的社会底层。也就是说，地理空间的转换并没有给她们的社会流动带来根本性的社会资本。从调查和研究中发现，众多的“洗脚妹”依旧如第一代农民工那样，游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无法真正意义上融入到城市社区中来。所以，地理空间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洗脚妹”们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就社会分层而言，她们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匆匆过客甚至是看客，仍然是城市生活中的边缘人群。

其次，从社会认同来看，都市“洗脚妹”被城市与乡村主流文化双重不认同。城市的主流文化对都市“洗脚妹”带有一种固有的歧视，将其作为底层边缘人群不愿将其融入，乡村的主流文化则对都市“洗脚妹”带有一种固有的偏见，将其作为乡村价值文化的背离者加以唾弃。可以说，不论是城市主流文化还是乡村主流文化，都在逐渐地抛弃都市“洗脚妹”。一方面，都市“洗脚妹”对城市主流文化越来越“疏远”，虽然身在城市，却无法真正享受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生活；另一方面，都市“洗脚妹”对乡村主流文化也越来越“陌生”，长时期的远离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方式，被乡村主流价值日益排斥。正是在这双重的不认同之下，都市“洗脚妹”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中游弋和徘徊，她们的社会流动模式也就呈现出从乡村来到城市，最终又从城市边缘回归乡村边缘的横向流动、低水平流动特征。

综上，无论是在社会分层上还是在社会认同上，都市“洗脚妹”们都难以真正地融入现代都市生活，尽管从地域空间来看，她们的生活场域发生了从乡村到都市的转变，从社会职业来看，发生了从农作到“八小时”工作制的转变，但是因其身份地位、社会认同等并未在根本上发生变更，其社会流动仍旧是一种低水平横向流动的复制。因此，都市“洗脚妹”的社会流动呈现出“内卷化”特性：有财富的增长而无上升的发展，有平行流动的增加而无垂直流动的发展，“内卷化”是理解当下都市“洗脚妹”社会流动的关键词。

参考文献：

- [英] 波兰尼，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陈婴婴，1994，《职工结构与流动》，东方出版社。
- 费孝通，1999，《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
- 黄宗智，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 陆学艺，1991，《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
- 陆学艺，2004，《研究社会流动的意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8期。
- 李强，1993，《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 [德] 勒温，1997，《拓扑心理学原理》，高觉敷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 [美] 米尔斯，2005，《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二版），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
- 唐世平，2006，《社会流动、地位市场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吴毅，2007，《记述村庄的政治》，湖北人民出版社。
- 应星，2006，《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 严善平，2000，《大城市社会流动额实态与机制——来自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郑丹丹、张芳，2006，《社会流动的脉络与机制——以大学生求职为例》，《青年研究》第5期。
- 周玉，2006，《制度排斥与再生产——当前农村社会流动的限制机制分析》，《东南学术》第5期。
- Humphreys, L. 1975.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Aldine.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蕊